



三山五园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合作项目



畅春园研究

清代皇家园林研究论丛（第1辑）

阚红柳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畅春园研究

编委会

崔述强	于 军	关成启	彭兴业	张宝章
于佩丽	牛爱忠	叶亮清	刘耀忠	李 博
张东旭	陈名杰	杨念群	赵世伟	徐永全
钱进朝	夏明方	黄兴涛	董建中	阚红柳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畅春园研究 / 阚红柳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1

(清代皇家园林研究论丛. 第 1 辑)

ISBN 978-7-5656-2625-8

I. ①畅… II. ①阚… III. ①古典园林—研究—北京市—清代 IV. ①K928. 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9203 号

CHANG CHUN YUAN YAN JIU

畅春园研究

阚红柳◎主编

责任编辑 赵自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湘潭市风帆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400 千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黄兴涛

三山五园，是清代皇家园林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谓“三山”，原本指的是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而五园，则除了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之外，还包括圆明园和畅春园。但就广义而言，三山五园所涵括的园林建筑其实并不局限于此，它也是可用以概指整个北京西郊一带的清代皇家园林的一种泛称。三山五园的兴建、繁盛与衰落，见证了明清以来社会之变迁，王朝之盛衰，也汇聚了清代思想、文化艺术之精华，它不仅是清代皇家园林研究的重心所在，无疑也是清代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清代皇家园林的研究涉及历史、园林和建筑艺术等许多领域，具有非常突出的跨学科特点，其研究空间的开辟、研究课题的开展乃至研究内容的深化，均需要拥有各种资源优势和不同研究重心的各家单位团结协作，否则难以奏功。长期以来，寻求并重视学术合作，尤其是与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恭王府等清代园林管理机构的协同创新，乃是中国人民大学清代皇家园林研究的宝贵传统，事实证明这也是该学术领域能够不断有所开拓，积累渐次增厚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在清代皇家园林方面的研究始于复校之初。早在1978年，清史研究所即与颐和园管理处合作编写出版了《颐和园》一书，成为三山五园研究领域内带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著述，被列为《北

京史地丛书》之一，王道成等先生即参与了写作。20 世纪 80 年代，清史所逐步发展成为海内外的清史研究重镇，关于皇家园林的研究也取得更为丰富的成果。1982 年至 1983 年，受教育部委托，人大清史所曾举办过为期一年的全国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师进修班。在进修学生临近毕业之际，根据人大老校长李文海先生的提议，清史所特将这批年轻的史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带领他们对近代北京史迹进行实地的考察、调研，得到了北京各家文保单位的支持，最终形成王道成、林克光、孔祥吉主编的《近代京华史迹》一书，1985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后又修订扩版，除了包括颐和园、圆明园等三山五园方面的史迹介绍外，还涉及恭王府、庆王府等北京其他皇家园林的内容。1986 年，王道成先生又出版《圆明园》一书，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后来他还积极参与有关圆明园重建问题的各种讨论，并编辑出版了厚重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一书，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年来，王道成先生发表了大量关于清代皇家园林研究方面的各类成果，成为国内从历史角度研究清代皇家园林的重要代表人物。1988 年，戴逸先生撰成《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一文，高屋建瓴，较早地从北京城市建设的角度探讨并肯定清代皇家园林的历史价值。其后的 1992 年，戴先生又出版《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其中的第八章题为《北京城市建设》，自觉地将三山五园作为历史专题，细致梳理了其所兴建的历史脉络，进而总结分析了其对清代京城乃至当代北京城市格局的历史影响。这是当时史学界研究清代皇家园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除了三山五园之外，人大清史所以对承德避暑山庄的研究，也做出了突出贡献。戴逸、王思治、罗明、张羽新等先生，可谓代表。尤其是王思治先生，成绩最为显著。1980 年，清史所与承德文物局合作编

写了《承德避暑山庄》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王思治、罗明等代表清史所做了重要工作。2000年，王思治先生又在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一书。2003年，在避暑山庄建园300周年之际，王思治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专门讲授《避暑山庄百年史》，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同年，为纪念避暑山庄建园30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戴逸先生主编了该会论文集，题为《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2005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避暑山庄学及其与之相关的清代历史研究。

可以说，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别具匠心的个人钻研、集体努力以及同其他单位合作所陆续取得的研究积累，确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清代皇家园林领域的重要学术地位。

为继承和发扬清史研究所在清代皇家园林研究领域的学术优势以及同园林管理部门紧密合作的传统，进一步推动和开展清代皇家园林领域的研究，2008年，清史所与圆明园管理处合作，共同创建了“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后来，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也正式加入进来，形成三家精诚合作的学术家园，旨在共同搭建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资源共享的文化发展平台，希望对促进北京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丰富市民社会文化生活有所助益。应该看到，当代史学研究实际上也越来越需要与社会文化实践的结合，研究者关注社会、服务社会文化建设的迫切性可谓有增无减。在这方面，如何转换思路，拓宽视野，某种程度上也对清史研究所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自然应当成为探索历史研究与现实文化建设自觉结合的窗口之一。

三山五园的研究，跨越历史与现实，成为清史研究与当代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重要桥梁，也是“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和园林管理

等部门实现合作的学术资源。各家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持，是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保证。一方面，三山五园研究的丰富学术成果的积淀，可以为社会服务和文化利用创造条件，发挥强大厚重的学术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三山五园的园林实践、文化产品的开发以及具体的实地、实物考察，也可为整个清史研究注入新鲜的动力和活力，这一催化剂与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边疆民族、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研究交汇融合，还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催生出新的学术课题，有助于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丰富和深化现有研究思路。

秉承上述理念，“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自创建以来，对清代皇家园林尤其是三山五园的专题研究进行了认真论证和规划，并诉诸实践。我们自觉把基础研究和社会服务两相结合：一方面，注重史料积累和学术研究的双线推进，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设计课题时尽可能考虑到社会需求，强化研究成果的社会化转换。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离不开海淀区委宣传部、尤其是其直接领导的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和圆明园管理处的积极推动、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特别是陈名杰部长和叶亮清主任，可以说发挥了关键作用。还在陈、叶担任圆明园管理处正副主任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此后的曹宇明主任等圆明园管理处领导又继续推动了这一合作。我们非常珍惜与圆明园的长期合作关系，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得到海淀区委宣传部及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的持续性支持。

2011年，清史所王道成先生作为主编之一，参与了圆明园管理处与中西书局合作编译出版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第一辑）的工作，译丛涵括英法联军侵华关键人物的亲历回忆录14种，可谓是从英法联军视角描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资料库，也是圆明园劫难历史资料

的首次大规模、成系列地在我国翻译出版，它揭露了当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大量历史细节和第一手原始资料。

近年来，“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精诚合作，共同设计了以三山五园研究为中心的史事编年、专题研究和史料汇编三者相结合的研究规划。2014年，中心何瑜教授主编的《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利用起居注、实录、清帝御制诗文集等历史文献以及清代档案，首次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清代嘉庆朝之前三山五园的历史发展脉络，是规划研究成果的初步呈现。嘉庆—宣统朝部分也于2015年出版。

三山五园的历史文化课题兼具历史研究、园林与建筑艺术、文化传承和当代城市建设等多方面的价值，学术资源丰富，研究空间广阔，在今后若干年内，可能仍将成为我们中心展开学术探索的核心目标。今年，我们中心将得到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同以叶亮清为主任的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继续深入合作，再次推出最新成果，即由阚红柳主编的《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和《畅春园研究》论丛。前者是海外有关学术研究成果的编译整理，后者是关于清代畅春园的学术研究的最新论集。“译丛”共遴选海外英文发表的关于三山五园研究的学术论文12篇，所选论文涵盖国家、地区广泛，涉及领域众多，视角新颖，是近年来明清皇家园林研究领域内较为全面反映海外学术前沿的标志性成果。“论丛”则以入关后的清代第一个皇家园林畅春园为专门研究对象，组织学者撰写专题论文14篇（含研究综述1篇），分别从该园的历史变迁，最初建园理念、居园理政、园林格局、民族文化特色、艺术及思想内涵等诸多方面，首次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我们相信，“译丛”和“论丛”的出版，将有助于推进学界的相关研究，对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园

区的当代建设亦将不无助益。

阚红柳同志是清史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作为新一代清代文化史研究的佼佼者，她近年来以高度的热情加入到清代皇家园林研究队伍中来，为我们的事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我衷心地感谢她的付出和责任感，也相信在她的带领下，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2015年5月21日

目 录

序	黄兴涛	(1)
康熙皇帝的“园林观”		
——以畅春园为中心	阚红柳	(1)
畅春园与康熙帝的“居园理政”	颜 军	(30)
从畅春园看满汉文化的融合	孙 喆	(59)
朝鲜人笔下的畅春园		
——《燕行录全集》中的相关载录	董建中	(79)
崇俭戒奢：康熙帝与畅春园的兴建、扩建与日常管理		
.....	阚红柳	(108)
雍正时期畅春园的职能转变	宋 瞳	(134)
清代园庭畅春园衰败述略	杨剑利	(145)
晚明清初北京西郊城市空间功能的转换		
——试以畅春园周边地区为例	廖菊棟	(166)
畅春园区位论	丁 超	(201)
畅春园兴衰的历史地理考察	周 磊	(225)
“畅春园”，还是“畅春苑”？	董建中	(243)
从康奈尔大学藏郎世宁款《畅春校射图》谈起	翟 翔	(254)
畅春园园林美学概说		
——兼论畅春园遗址的保护与遗址公园的建设 ...	樊志斌	(263)
畅春园研究综述	朱婷婷	(283)
附录：畅春园研究论著目录		(298)
后记		(309)

康熙皇帝的“园林观”^①

——以畅春园为中心

阚红柳

建于北京西郊的畅春园，不仅是清代君主康熙皇帝日常生活的主要居所^②，亦为其处理王朝行政事务，享有社会文化空间的重要场所。据清人吴振棫称，“计一岁之中（康熙帝）幸热河者半，驻畅春者又三分之二”。^③ 这座离宫御苑的一草一木，一殿一阁，均浸染了康熙帝具有个性色彩的生活理想、政治理念以及文化诉求，笔者拟以畅春园为中心，从上述三方面深入探讨康熙皇帝的“园林观”。所谓“园林观”，

① 阚红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清代学术思想史。

“园林观”，即从宏观角度分析康熙帝的园林观念，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主要有崔山《期万类之义和，思大化之周浹——康熙造园思想研究》，天津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以及王其亨、崔山《中国皇家造园思想家——康熙》（《中国园林》2006年第11期），通过例举康熙帝造园的实绩，探讨康熙帝造园的思想动机、价值取向、艺术风格、实学精神、深远影响等；赵连稳、李佳松《京西第一名园：畅春园筑园理念》，《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文章从风水宝地，皇帝钦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因地制宜，追求淳朴、皇权至尊，尊卑分明四个方面探讨了康熙帝的筑园理念，等等。笔者在此基础上另辟蹊径，从康熙帝在畅春园的兴建、畅春园内的生活与活动诸方面探讨作为清代君主的康熙帝独特的园林观念。

② 据学者统计，“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二月二十二日玄烨由玉泉山移驻畅春园，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八时崩于此园内寝宫，历时35年，在此期间内，他共驻蹕该园3907天，平均每年在此居住111天。从这一数字看，康熙帝的后半生，近1/3的时间是在此园内度过的。可见苑园生活，在他的一生中占有何等重要地位。”（参见张莉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9·养生妙法》，第15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8，第200页，中华书局，2005年。

本文特用以宏观考察康熙帝在畅春园的营建以及园内生活、行为诸方面所展示出来的对园林功能的独特看法。

一、乐享天伦——畅春园的生活功能

“宫馆御苑，足为宁神怡性之所”^①，应该看到，康熙帝兴建畅春园的最初动机还是为了怡情养性，调剂生活。“每以春秋佳日，天宇澄鲜之时，或盛夏郁蒸，炎景烁金之候。几务少暇，则祇奉颐养，游息于兹。足以迓清和而涤烦暑，寄远瞩而康慈颜。扶輿后先，承欢爱日，有天伦之乐焉。”^②为久居皇城之中，政务繁忙的君主提供排忧解难、乐享天伦的生活空间，是畅春园的首要功能。

1. 畅春园为疗疾之所

初建畅春园，与康熙十八年（1679年）入秋之后皇帝生病直接相关。如康熙帝自己所言：

朕临御以来日夕万几，罔自暇逸，久积心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构为别墅。^③

前明李园的美景让病中的皇帝乐而忘忧，身心舒畅，从而下定决心，依照旧园规模，兴建新园，故而，在康熙帝眼中，畅春园首先是疗疾之所。以山水自然的美景，治愈人世之烦忧与纷扰，园林的这一功能给皇帝留下至深印象。每每一场疾病最严重的阶段过后，皇帝都

① 清圣祖：《畅春园记》，故宫博物院编《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卷13，海南出版社，2000年。

② 清圣祖：《畅春园记》，故宫博物院编《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卷13。

③ 清圣祖：《畅春园记》，故宫博物院编《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卷13。

会亲赴畅春园调养身体。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因岁早之故，抑郁靡宁，兼遇丧事，体加劳瘁”^①，故而“圣躬不安，天颜清减”^②，诸大臣恳请皇帝“行幸边外，以养圣躬”^③，此次巡幸边外归来后，康熙帝曾于十一月十九日驻蹕畅春园，但当天即返回宫中。这次患病，康熙帝身心俱疲，时至次年，仍身体消瘦，疲惫不堪，以至于九卿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再次提请，“皇上因天时亢旱，宵旰焦劳，圣容清减。恭请调摄圣躬，以慰中外臣民之望”。^④这一年是畅春园建成以来皇帝亲临最多的一年。康熙帝九次驾临畅春园，借山水自然之风光，聊以养病，聊以解忧。五月，畅春园观赏牡丹，康熙帝写下诗句：

撷取群芳置案头，天香一段贮清幽。

人生常有悲欢事，惟尔闲情不晓愁。^⑤

通过山东巡抚佛伦的奏折以及康熙帝的回复可以从中体会，忧病交加的康熙帝对畅春园的期待。佛伦通过邸报得知康熙帝“圣躬违豫”“不胜战栗”“坐卧不安”，康熙帝收到奏折后朱批回复，“朕体大安了，仍幸畅春园调养”。^⑥一年来在畅春园的病中疗养生活，加深了康熙帝的印象，提升了畅春园的地位。畅春园总管大臣即于此年设置，以加强对畅春园的管理。

① 《清圣祖实录》卷141，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丙子条。此次丧事，指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十日，孝懿仁皇后驾崩之事。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890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③ 《清圣祖实录》卷141，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丙子条。

④ 《清圣祖实录》卷144，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己酉条。

⑤ 转引自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第2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

⑥ 《山东巡抚佛伦奏请停本年秋审事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五月，康熙帝患疟疾，健康堪忧，以至不能理政，据康熙帝朱批回溯病程，“朕自初八日始患汗病，十三日始疟疾，隔一日来一次，甚重。二十七日疟疾痊愈”，大病刚愈，即启程赴畅春园进一步调养，“朕体今大安了，好像旧病诸疾都已根除了。今大安了。故初六日幸畅春园”。^① 畅春园作为病后颐养之所，有益身心的观念日益深入皇帝之心，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谕内大臣大学士九卿等：郊祀大典，诸臣以天时严寒，请朕勿亲诣行礼。朕巡行塞外，水土极其调适，驻蹕畅春园，水土亦佳，是以身体强健，步履安和，毫不知倦，并无头眩足痛之苦。虽寻常小疾，亦一无所萌”。^② 康熙帝对畅春园水土的自信亦影响到朝中大臣，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初六日，“时畅春园群花开放，帝因清明祭祀皇太后，不肯前往。诸王、大臣奏请帝暂驻蹕畅春园。因其水之善，以调养身体”。^③

以畅春园为疗疾之所的认识一直持续到康熙帝病逝。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七日，感到身体不适的康熙帝自南苑回驻畅春园，理想中的疗疾之所给年老体弱的皇帝以病愈的希望，自初十日至十二日，康熙帝均传谕，“朕体稍愈”^④。但至十一月十三日，终卒于畅春园内清溪书屋。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作为生活空间的畅春园，自始至终发挥着疗疾之所的功能。在康熙帝心目中，畅春园，是排遣烦恼和调养身体的理想之地。

① 《川陕总督佛伦奏请圣躬欠安赴京请安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3页。

② 清圣祖：《谕内大臣大学士九卿等》，故宫博物院编《清圣祖御制文三集》，卷13。

③ 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第146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300，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辛卯、丙辰、庚巳条。

2. 畅春园为亲近自然、乐享田园渔猎之所

畅春园之所以多次在康熙帝患病之时起到抚慰身心，颐养身体的特殊功效，则源于其山水自然之美景，以及康熙帝在园中能够享受到的怡然自得的生活。畅春园是康熙帝亲近自然、乐享田园渔猎之所。

康熙帝首次考察海淀，为其地之泉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然风光所叹服：

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万泉庄平地涌泉，奔流瀼瀼，汇于丹棱泖。泖之大，以百顷，沃野平畴，澄波远岫，绮合绣错，盖神皋之胜区也。^①

为此康熙帝选址李园，兴建畅春园。在康熙帝的园林观念中，保持自然之美占有重要地位，“爰诏有司，少加规度，依高为阜，即卑成池。相体势之自然，取石譬夫固有”^②，为此，畅春园的建设首要任务为充分发挥万泉庄一带泉水的作用。如张宝章所言，“畅春园建成一座山环水抱的水景园”，“畅春园的四周围墙，全在万泉河水的包围环绕之中”^③，园内河湖可以行舟，亭台楼阁亦依水而建。河湖流动，增添了畅春园的自然之美。并且，在法国传教士白晋看来，康熙帝“让人在这座离宫内挖了两个大池塘和两三条水沟。除此之外，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像康熙皇帝这样有财势的君主应有的豪华迹象了”^④，畅春园内水源丰富，为园林的皇家气象造势。翰林学士张廷瓚游览御园，所撰组诗中有赞赏畅春园内河湖的诗句：

① 清圣祖：《畅春园记》，故宫博物院编《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卷13。

② 清圣祖：《畅春园记》，故宫博物院编《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卷13。

③ 张宝章：《畅春园记盛》，第11页，第12页，开明出版社，2009年。

④ [法]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刘耀武校，第1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磷磷石色鮎苍苔，一曲清溪许溯洄。
夹岸蝉声听不断，小舟移过板桥来。
平湖风细镜同清，指鮎亭台烟雾生。
苍翠远飞千树外，西山一带翠屏横。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北征噶尔丹，给皇太子的谕旨中多次提到令其魂牵梦绕的畅春园内之水，看到黄河结冰，惦记京城，令皇太子“京师水泊冰结之日，可记之报闻”，渡黄河之时，“见冰凌贴于两岸”，河水与初到之日不同，“水波不兴，与渡畅春园之河相似”。^①水源充足，确保了植被的生长，畅春园内松柏长青，玉兰、腊梅、牡丹争艳，繁花似锦。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三月，康熙帝宠臣高士奇告老还乡，得恩赏，可在畅春园中“遍观园中诸景”，在其所著《蓬山密记》中，高士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园中的植物，渊鉴斋后，“玉兰腊梅，岁岁盛开”，“篆竹两丛，猗猗青翠，牡丹异种，开满阑槛间。国色天香，人世罕睹”；乘舟而行，可见两岸绛桃堤、丁香堤，“绛桃时已花谢，白丁香初开，琼林瑶蕊，一望参差。黄刺梅含英耀日，繁艳无比”；西岸，有“葡萄架连数亩，有黑、白、紫、绿及公领孙、璵璠诸种，皆自哈蜜贡来”；舟至东岸，步入山岭，“皆种塞北所移山枫、婆罗树，其中可以引牵，可以布帆”；天馥斋前“皆植腊梅。梅花冬不畏寒，开花如南土”。^②

园内诸花，均是康熙帝心头之爱。赏花吟诗，成为其园内生活的重要内容。康熙帝曾写诗《（畅春）园中无处无花，触目皆是，故作词自嘲》，诗中写道：“无花无酒亦氤氲，况有清香到处闻。万紫千红虽

① 清圣祖：《北征敕谕》，故宫博物院编《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卷22。

② 高士奇：《蓬山密记》，收入《古学汇刊》第1集第12册，第1—3页，上海国粹学报社，1912年。

瞬息，古稀吟咏忘辛勤。”^①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行军途中，仍不忘畅春园内花木状况。据潘良栋口述，“皇上途中，于三月二十五日见杏花开，曾问及京城如何”。为此，皇太子允初上奏折汇报，“桃花三月十三日开，杏花自十九日始开”。^②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康熙帝从京城出发，开始第六次南巡，途中放心不下园中植物，要求值守在畅春园内的第三子允祉汇报情况，允祉等奏：“京城、畅春园周围桃花蕾，早已长大，想是七八天内即开。”^③

康熙帝还尝试将南方植物移植到畅春园，“江南梅花正月即放，至五月始实。朕取至畅春园种之，见其三月花放，亦于五月结实。花放于两月之前，而同至五月结实，此皆水土之故也”。通过种植试验，康熙帝对南北之差异有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南方之物，开花吐穗虽早，而成实迟，故食之则难消；北方之物，开花吐穗虽迟，而成实速，故食之则易消。皆土性冷暖自然，不可强者”。^④ 园内还种植着从清凉山移植的松树，据高士奇记述，“上指莲花岩小松，云：此尔随朕清凉山时所移者，今已成树尔，可登岸摩挲之”。^⑤ 除了观赏性植物，畅春园内还种植了水稻。康熙皇帝亲自培育稻种，在畅春园内种植，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七月，写下绝句《畅春园观稻，时七月十一日也》：

七月紫芒五里香，近园遗种祝祯祥。

炎方塞北皆称瑞，稼穡天工岁乐穰。^⑥

① 转引自张宝章《畅春园记盛》，第18页。

② 《皇太子允初奏谢赏物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61页。

③ 《允祉等奏报接阅御批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88页。

④ 清圣祖：《谕起居注官揆叙等》，故宫博物院编《清圣祖御制文三集》卷12。

⑤ 高士奇：《高士奇集》卷1，《侍从畅春园宴游恭纪并序十首》，清康熙刻本。

⑥ 转引自张宝章《畅春园记盛》，第20页。